

发音变异还是发音变化？

Guoqiang Liu
Deakin University, Australi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varied pronunciation of the word meaning “I”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and seeks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whether such varied pronunciation is a mere variation or signifies a change. Analysis of the empirical data involving informant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collected for this study has le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varied pronunciation of the word meaning “I” in question is a sound change in Shanghai dialect.

语言变异与语言变化

语言变异 (language variation) 和语言变化 (language change) 是语言使用中密切相关的两个方面，也是社会语言学重点关注的两个方面。

任何一种语言在使用中都存在广泛的共时变异 (synchronic variation)，这在语段结构、句法结构、音系结构、用词、词的发音等方面都有体现。以用词举例，在台湾国语中有人说“这样子”，也有人说“酱紫”；后者可被看作前者的变异。再以发音为例，在上海方言中，有人把“我”字发成 [ɲu:]，也有人将其发成 [u:]；后者也是前者的变异。社会语言学界中一般认为语言变异是由一系列社会因素造成，这些因素可包括社会阶层、性别、年龄。这就是说，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的人在语言使用中会有所不同。

语言是有生命的，而任何有生命的事物都会发展、变化。语言的变化是一个渐进地朝着某个方向呈线性发展的过程 (Labov 1994)。换句话说，语言变化不会是突发性的。上海方言中以前称厨房为“灶披间”，因为以前厨房间大多是在正房旁另搭建的一间小屋，而且使用老式的炊灶。“灶披间”现在基本上已被“厨房间”这个词所取代，不过这不是人们某一夜睡醒后一下子都改了口，而是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初先有一部分人用了“厨房间”这个词，而后使用这个词的人越来越多，直至绝大多数人都开始使用“厨房间”时这个语言变化过程才得以完成。从这点上来说，语言变化之前必定有语言变异现象，而语言变异是语言变化的先决条件 (Guy 2003: 371)。换句

话说，没有语言变异，语言变化也就无从谈起；语言变化是从语言变异发展而成的。

联系语言变化讨论语言变异时，我们可以将语言变异大致分成三大类。一类是长期稳定的变异。这类变异长期存在，没有发展成变化；也就是说，一种新出现的语言形式与原有的形式并存，而且没有取代原有形式的迹象。比如说，上海方言中的“我”和“阿拉”就已并存很长时间，可以说是长期稳定的变异的一个例子。

另一类是语言变异即将演变成语言变化。这类变异明显已接近变化。也就是说，新的语言形式已被绝大多数人接受和使用。虽然仍有很少一部分人使用旧的形式，但变化已基本成定数。上面提到的“厨房间”取代“灶披间”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第三类语言变异是正在发展中的变异。它们中的一些语言变异形式若有足够的动力即可能发展成为语言变化，但若缺乏动力也会演变成长期稳定的语言异体。这一类语言变异对于研究正在进行中的语言变化的学者最具吸引力，因为它们提供了机会，让语言变化研究者寻找正在发生的语言变化，观察语言变化的轨迹，研究影响其轨迹的各种因素。

以 Bloomfield (1933) 和 Saussure (1959) 为代表的传统语言学派认为语言变化本身是无法观察到的，可能被观察到的只是语言变化的结果。传统语言学派还认为语言变异只不过自由变异或方言混杂的现象，对语言发展意义甚微。在解释语言的发展进程上，Labov (1963, 1966) 开创的变异社会语言学 (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 取得了突破性的发

展，认为语言的历时变化 (diachronic change) 反映并扎根于共时变异 (synchronic variation)。从此时起，人们认为可通过共时方式对进行中的语言变化加以研究，而研究进行中的语言变化则又被认为是当代语言学中最显著的单项成就 (Chambers 1995: 147)。语言变异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它其实是一把钥匙，使我们能够开启大门，观察语言是如何变化的。

研究进行中的语言变化的最全面方法似乎是全程追踪整个变化过程。然而，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个过程可能极其漫长，而且某个受关注的共时变异可能最终没有演变成语言变化，使得研究无果而终。因此，全程追踪方法无人采用，而语言变化一般是通过真实时间 (real time) 观察和显象时间 (apparent time) 观察来加以研究的。

真实时间数据一般通过两种观察方法加以收集，一是在原有数据的基础上收集类似的数据，然后将新收集的数据与原有数据加以比较；二是对若干年以前受调查的人再次进行调查，从而比较两次调查的结果。然而，语言变化研究中真实时间数据使用不多，原因是获得真实时间数据极其困难，而且真实时间数据的可比较性、语料取样的设计、调查对象使用特定语言的方法、调查人群的人口学变化等因素在研究中不可忽略，从而大大增加研究的难度。

相比之下，语言变化研究中使用较多的是通过显象时间观察得到的数据。显象时间数据收集方法是同时对不同年龄段者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调查、观察，通过比较各年龄段的语言使用状况研究语言的变化。使用“显象时间概念” (apparent time construct) 对进行中的语言变化进行推断的基础是个人语言使用具有稳定性的假定。这个假定认为从

青少年后期起，人的语言使用的主要特征基本上定型，而且在其一生中基本保持稳定。这种个人语言使用具有稳定性的假定已得到一些研究者的证实，如 Labov (1994) 和 Cukor-Avila (2000)。

采用显象时间概念来收集语言数据，从而对语言变化进行研究是一种比较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其优点是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采集语言的共时变异来推断语言历时变化，使得研究者能够同时采得数十年中反映语言使用状况的各个时期横断面的数据。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同时采集 20 岁、30 岁、40 岁年龄段的语言使用数据，所采集到的数据就相当于跨经 30 年所采集到的数据；如果数据显示 20 岁年龄段的人在语言使用中某个语言特征普遍不同于 30 岁以上年龄段的人，这很可能表示这个语言特征正在发生变化。从这点上说，运用显象时间概念收集到的不同年龄段语言使用中的共时变异可揭示语言的历时变化。

在解释显象时间数据时需要考虑到数据中年龄级差 (age grading) 的可能性。年龄级差是指一代人的语言使用虽不同于上一代人，但这一代人到了一定年龄后其语言使用又会趋同于上一代人在相同年龄段的语言使用。因此，数代人的语言使用并没有发生变化，而两代人在某个时候的语言使用不同的现象只不过是一种长期稳定的语言变异。语言变异研究者认为职场也会对年轻人的语言使用造成压力，迫使他们改变自己的语言使用习惯去适应职场中更有权势的年龄较大者的语言使用 (Sankoff & Laberge 1978)。Eckert (1997: 153) 就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语言也会变得保守，使用与上一代人相同的语言。正因为这个原因，语言变化研究者必须考虑显象时间数据反映的是语言使用正在发生变化还是仅为年龄级差现象。

语音变化的一个特点是词汇扩散 (lexical diffusion), 即起初语言变化发生于某一个词, 然后蔓延到含有相同音素的另一个词, 再蔓延到含有相同音素的其他词。有人认为词汇扩散是某个内部变化的后期阶段典型特征 (Labov 1994: 543); 也有人认为它指示了音系变化的最初阶段 (Lass 1997: 141)。词汇扩散现象也是确定某个发音的改变已从语言变异发展到语言变化的一种方法。如果某个词的发音有所改变, 而这个音变又扩散到了另一个或另几个词, 这就进一步证实此音变已不是单纯的发音变异, 而是语言变化了, 而且造成了语言结构上的音系变化。

综上所述, 正在进行中的语言变化可以得到观察、研究, 而语言变化可通过研究语言变异来加以揭示, 因为语言变化之初必然见于语言变异, 虽然并非所有语言变异都将导致语言变化。在此背景之下, 本文将讨论对上海方言中一个音变现象的一项研究, 重点在于探讨上海方言中的这一音变现象是单纯的语言变异还是已经演变为语言变化; 如果说它是语言变化, 我们又有多大的确定性。

变化中的上海方言

上海方言属中国七大方言区中的吴方言区。本文涉及的上
海方言为上海城区人口所讲的方言, 不包括上海市郊的方言。

上海在自 1834 年开埠以来的一百六十年中发展成了一个国际大都市。上海也是一个移民城市, 在其最初的一百年间, 上海人口中来自于中国其他地方的移民占 80%。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起, 上海开始了快速的经济发
展, 又一

次吸引了中国各地的移民。目前上海人口中仍有 35% 是移民。

因此，上海城区人所使用的上海方言一直与来到上海的移民所说的一些其他方言有所接触。而且，上海方言近年来还特别受到了中国官方语言普通话的巨大压力。正因为如此，上海方言一直经历着不断的变化。正如钱乃荣 (2003: 3) 所指出，上海在其一百六十年历史中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文化变化的同时，也发生了巨大的语言变化，例如上海方言在 1853 年有 63 个单元音和复合元音，而目前则减少到了 32 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海方言是研究语言变化的一个独特个案。

数据收集

这项研究中的重点在于上海方言中“我”字的发音变异或变化，研究对象为在上海居住两代人以上、说上海方言的当地居民。数据收集的时间在 2003 年 11 月至 2005 年 12 月之间。

直到十多年前，“我”字在上海方言中的发音一直是 [ŋu:]，钱乃荣所著《上海语言发展史》中列出的至 1992 年对“我”字的发音调查结果仍为 [ŋu:] (2003: 16)。“我”字的变异发音 [u:] 以前一直被认为非上海方言母语者学说上海话发音不准的一个现象。但近年来，上海方言母语者中说“我”字时发音有所变异，有 [ŋu:] 与 [u:] 并存现象。例如，据 2005 年 1 月 23 日《上海青年报》载，上海一位人大代表就认为许多年轻人说上海话吐字不准，把“我”说成“吾”或“窝”。在上海街上听人们说话就能发现“我”字

的发音已经发生了变异，有些人已将鼻音化的首辅音 [ŋ] 略去。

这项研究的数据收集项目包括受调查人的下列信息：

- 年龄段 (分 20 以下、21-25、26-30、31-35、36-40、41-45、45 以上)
- 性别
- “我”字发音为 [ŋu:] 还是 [u:]
- 始终发某个音，还是 [ŋu:] 还是 [u:] 混用
- 若通常发 [u:]，是否还能发 [ŋu:]

数据收集场所为公共场所，包括商场、街头、咖啡馆、公交车站、地铁站、火车站、机场、饮食店等等。收集数据时，调查者先向受访人问路或求助；在此期间，调查者诱使受访人在自然语境中说出“我”字，然后询问受访人的其他情况，例如年龄段、性别、一贯发某个音还是 [ŋu:] 还是 [u:] 混用、能否发 [ŋu:] 等等。在询问之前，调查者简要地说明询问目的是为一项语言变化的研究收集数据。七个年龄段中每个年龄段的讲上海方言的受访人数均为 50 人，其中男女各 25 名。

数据分析

本文分五个方面叙述调查结果，即各年龄段受访人在自然语境中发 [u:] 者的比率，各年龄段在自然语境中发 [u:] 音者的男、女性别比率，各年龄段一贯发 [u:] 音者的比率，各年龄段不会发 [ŋu:] 音者的比率，以及各年龄段 [u:] 发音扩散至其他首辅音发音为 [ŋu:] 的字的比率。这五个方面的调查结果以下列图表显示。

图表 1：各年龄段在自然语境中发 [u:] 音者的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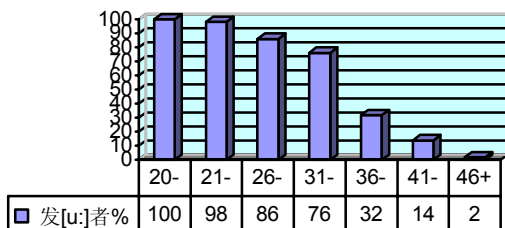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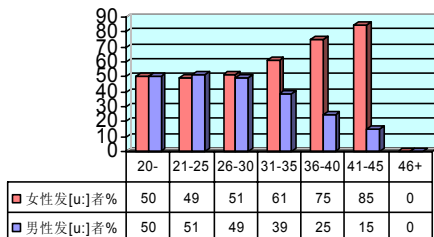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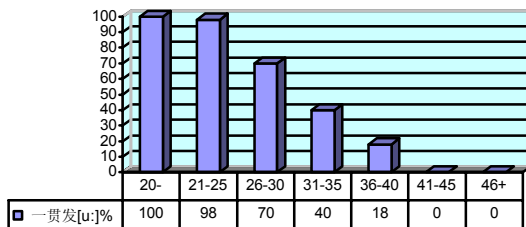
图 1 显示，年龄段越小，将“我”字发成新音 [u:] 的人比率就越大。调查对象中 46 岁以上年龄段中无人发 [u:] 的新音，而 20 岁以下和 21 – 25 岁这两组人群几乎全部发新音 [u:]。受调查的 26 – 45 岁年龄段可被视为从旧音 [ŋu:] 到新音 [u:] 的过渡年龄段。也就是说，41 – 45 岁年龄段中仅有少数人使用 [u:] 的新发音，其比率为 14%；而到了 26 – 30 岁年龄段，发 [u:] 新者的比率已占绝大多数 (86%)，显示过渡基本完成。31 – 35 岁年龄段和 36 – 40 年龄段之间似乎成分水岭，36 岁以上的人大多发 [ŋu:] 的旧音，而 35 岁以下的人基本上发 [u:] 的新音。

图表 2：各年龄段在自然语境中发 [u:] 音者的男女性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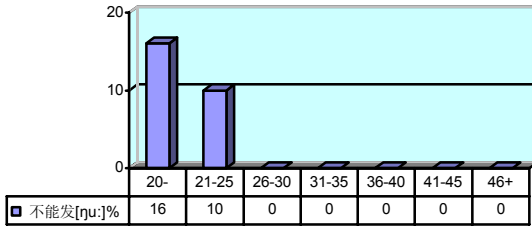
如图 2 所示，20 岁以下至 30 岁的年龄段中在自然语境中将“我”字发成 [u:] 的男女比率大致相同。但是，在 31 – 45 岁年龄段中，将“我”字发成 [u:] 的女性 (61%) 比率远远大于男性 (39%)；而且年龄越大，女性的比率也就越大；41 – 45 岁年龄段中发 [u:] 者中女性比率达到了 85%。不过，在分析该比率时应考虑到调查数据中发 [u:] 音者的实际人数很少，在 41-45 岁年龄段中一共只有 7 人。

图表 3：各年龄段发 [u:] 音者中一贯发此音的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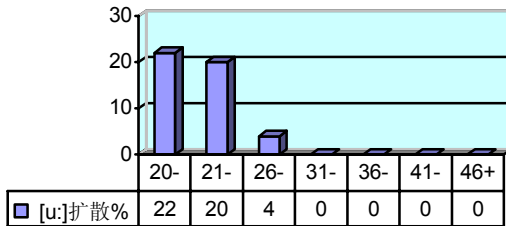
在调查中，调查者还询问将“我”字发成 [u:] 的受访人是一贯发 [u:] 音还是 [u:] 与 [ŋu:] 混用。如图 3 所示，36 – 40 年龄段的受访人中只有 18% 一贯发此音。值得注意的是受访人年龄段越低，一贯发 [u:] 音者的比率也就越大。在 31 – 35 岁年龄段中，一贯发 [u:] 音的受访人为 40%，26 – 30 岁年龄段的一贯发此音者比率达到了 70%，而 21 – 25 岁年龄段和 20 岁以下年龄段中的人则基本上全部一贯发 [u:] 音。

图表 4：各年龄段不会发 [ŋu:] 音者的比率



如图 4 所示，受访人中 26 岁以上的人都能发旧音 [ŋu:]，但 25 岁以下者中却有些人不会发此音，虽然这些人的比率不大。21 - 25 岁年龄段的受访人有 10% 的人不会发旧音 [ŋu:]，而 20 岁以下年龄段的人不会发此音者的比率为 16%。与 21 - 25 岁年龄段的人相比，20 岁以下年龄段的人不会发旧音 [ŋu:] 的比率要高出 6 个百分点。

图表 5：各年龄段 [u:] 发音扩散至其他字的比率



上海方言中另有几个字的首辅音也为 [ŋ]，比如“饿”字和“俄”字的发音就与“我”字的旧发音一样。在调查“我”字音变时，特别是研究其是否为语言变化时，有必要同时调查发音与“我”字相似的一些字的发音，例如“饿”字和“俄”字的发音，以确定这些字的发音有无变异现象，以及

上海方言中将 [ŋu:] 发成 [u:] 的现象有无扩散。为此，调查者同时也对受访人对这两个字的发音情况进行了调查，图表 5 显示了此调查结果。如图表所示，26 – 30 岁年龄段中有个别人 (2 人，占 4%) 将“饿”字或“俄”字发成 [u:]，而发此音的人数比率在 21 – 25 岁年龄段和 20 岁以下年龄段大有增加，分别为 20% 和 22%。

上海方言中的首辅音 [ŋ] 在其他方言中不多见，一般也被认为是非上海本地人，特别是讲非吴语方言者在学讲上海方言中较难学会的一个发音。为证实这一点，调查者也对在上海的非吴语背景的 50 位移民作了这方面的调查。在这 50 人中，能够用上海方言把“我”字发成 [ŋu:] 的人 (包括模仿调查者发此音) 仅有 7 人，占 14%。这说明上海方言中的首辅音 [ŋ] 对于非上海本地人，特别是讲非吴语方言者来说确实不易学会。

讨论

首先，上述数据毫无疑问地表明上海城区方言中“我”字的发音存在变异现象。一方面，原有的发音 [ŋu:] 依然有人使用；另一方面，新的发音 [u:] 作为一种变体与原有的发音 [ŋu:] 并存。鉴于语言变化研究中共时变异可被视为历时变化的先决条件，上海城区方言中“我”字发音存在共时变异现象，因此“我”字发音已经具备了语言变化的基本条件。

对上海方言中“我”字发音存在原有的 [ŋu:] 与新音 [u:] 并存的现象，若要确定新发音 [u:] 仅仅是原有发音 [ŋu:] 的一种变异还是“我”字正在发生音变，这需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新发音 [u:] 是否从低年龄段扩散到较高年龄段、

有无年龄级差：二是新发音 [u:] 有无扩散到其他发音相同的字。

语言变异总是起始于年轻人，从这点上来说语言变化依赖于年轻人对语言的创新使用。上海方言中“我”字的新发音 [u:] 也是年轻人的新创。从上述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年龄段越低，新发音 [u:] 的使用就越普遍。从年龄段分布来看，25 岁以下者基本上都发新音 [u:]。低年龄段中使用 [u:] 新音的比率高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新音 [u:] 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逐渐取代原有的发音 [ŋu:]，这对新发音 [u:] 属语言变化提供了一个证据。待现在的 25 岁以下者逐步取代 25 岁以上者，新音 [u:] 也将最终完全取代旧音 [ŋu:]。如果不考虑年龄级差问题，单从这一点来看上海方言“我”字的发音变异已具备演化成语言变化的条件。

如本文前述，从青少年后期起，人类语言使用状况基本定型，这个年龄段以后一般不会出现语言创新情况。本文讨论的研究数据还显示，25 岁以下者中有些人已经不能发“我”字的旧音 [ŋu:]。这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我”字发音年龄级差会在今后出现；也就是说，25 岁以下者基本上不会在到了一定岁数后又回到发旧音 [ŋu:] 的状况。较高年龄段，特别是 41-45 岁和 46 以上的年龄段中也存在使用新音 [u:] 的现象，虽然比率很低。在讨论这一点时，我们应当认识到 35 岁以上者是在成年后从原来的 [ŋu:] 发音转而使用新发音 [u:] 的。正因为如此，年龄段越高，一贯使用新发音 [u:] 者的比率就越低；另外，年龄段较高的人如果使用新发音 [u:]，一般也只是在某些时候使用，而不是一贯新发音 [u:]。年龄段较低的人中也有新旧发音混用的现象，只不过比率较低。对受访人的询问揭示，新旧发音混用的人一般根据说话的对象使用新发音或旧发音。如果对

年龄段较低、使用新发音 [u:] 的人讲话,有些年龄段较高的人很有可能会使用新发音 [u:]。虽然较低年龄段人群在使用新音中性别差别几乎没有,但在高年龄段人群中,女性使用新音的比率要大于男性。不过在考虑男女差别时应认识到高年龄段中实际使用新音者的人数很低,多一个或少一个新音使用者就会大大影响数据中的男女比率。从另一方面说,上述数据中有迹象显示一些做母亲的在与自己的孩子说话时,很可能使用与儿女发音相同的新音。高年龄段女性较之男性更可能认同低年龄段中发音的创新。不过,年龄段高的人使用新发音 [u:],无论是一贯使用还是有时使用,都是对新音的认可,对进一步巩固新音的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年龄段高的人使用新发音 [u:] 的对象是将“我”字发成 [u:] 的低年龄段人,这给年龄段低的人的印象是年龄段高的人已在放弃旧音,在实际上对年龄级差形成了围堵,进一步排除了年龄级差形成的可能。

上海方言中另有几个字的发音与“我”字相同,常用的有“饿”和“俄”。图表 5 显示的“我”字新发音 [u:] 在低年龄段已有向“饿”和“俄”这两个字扩散的现象。虽然这两个字的新音使用比率不高,但这也表明“我”字新发音 [u:] 不再是孤立的变异现象,而已经开始向发音相同的其他字扩散。这种扩散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一,新发音 [u:] 向其他字的扩散大大巩固了“我”字的新发音 [u:]。在“我”字新发音 [u:] 已经广被低年龄段上海方言使用者所接受的背景之下,新发音 [u:] 向其他字扩散将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深化,越来越多的人将对与“我”字旧发音相同的字采用新音 [u:],从而进一步排除了年轻人今后恢复使用旧音 [ŋu:] 的年龄级差的可能性,确定“我”字新发音 [u:] 作为语言变化的地位。新发音 [u:] 扩散的另一个重大意义是它

可能对上海方言的语音结构带来一些变化，促进了原来 [ŋu:] 音字的发音重组。在上海方言的语音体系中，随着“我”字新发音 [u:] 的出现及其作为语言变化地位的确立，原来发 [ŋu:] 音的字实际上已经裂变成两种发音：一是基本上仍然发 [ŋu:] 音的“饿”和“俄”；另一是“我”字的新音 [u:]，而且新音 [u:] 在向“饿”和“俄”等字扩散。新音 [u:] 在发音难易程度上当然要比旧音容易得多，人们发此音所需的努力也比发旧音小得多；从旧音变化到新音符合语言变化的一个规律，即从繁到简，从难到易。因此，我们有很充足的理由相信新音 [u:] 这种扩散的惯性将得到加强。如果这种扩散得到加强，新音 [u:] 就有很有可能逐步取代旧音 [ŋu:]，导致上海方言中 [ŋu:] 音的完全消失，完成上海方言语音体系中 [ŋu:] 到 [u:] 的演变。

从这项研究收集到的上述数据来看，36 岁以上年龄段中发新音 [u:] 的人占少数，他们基本上发旧音 [ŋu:]；而 30 岁以下年龄段的人说“我”字时基本上发新音 [u:]。因此，26 - 35 岁这个年龄段可以被看作从旧音到新音的过渡年龄段。

结论

本文在语言变异与语言变化之间关系的背景之下讨论了上海方言中“我”字旧发音 [ŋu:] 与新发音 [u:] 的使用状况数据，其中包括年龄段、性别；“我”字发音为 [ŋu:] 还是 [u:]；始终发某个音还是 [ŋu:] 还是 [u:] 混用；若通常发 [u:]，能否发 [ŋu:] 等方面。

上海方言中“我”字的变异发音 [u:] 原先只是母语为非吴语者学说上海话发音不准的一个现象。近年来，此变异发音逐渐被上海方言母语者，特别是年龄段较低上海本地人所接受和使用。本文的数据清楚地显示上海方言中“我”字的新发音 [u:] 已成为一种语言变化，因为它已得到年龄段低的人广泛使用，而且新音 [u:] 已在向与“我”字旧发音 [ŋu:] 相同的其他字扩散，即有人开始用新音 [u:] 取代这些字的发音。

目前，上海方言中 [ŋu:] 的发音依然存在，除了“我”以外，诸如“饿”和“俄”的另一些字基本上仍发 [ŋu:] 音。在 [ŋu:] 音没有完全消失之前，它有没有可能再次广泛被人们使用，使“我”字的发音再完全回到旧音 [ŋu:]？虽然这种情况无法完全排除，但即使发生这种情况，那也是另一个音变，丝毫不改变本文所讨论的“我”字新音为语言变化这个事实。

参考文献：

- Aitchison, J. (2001) *Language change : progress or decay?*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loomfield, L. (1933) *Languag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Winston.
- Chambers, J.K. (1995) *Sociolinguistic Theory: Language Variation and Its Social Significan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Chambers, J.K., P. Trudgill, and N. Schilling-Estes (eds.) 2001.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Malden, MA : Blackwell Publishers,.

- Cukor-Avila, P. (2000) *The Stability of Individual Vernaculars*.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MS.
- Eckert, P. (1997) Age as a sociolinguistic variable. In F. Coulmas (ed.) *Th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 Guy, G. R. (2003) Variationist approaches to phonological change. In Brian D. Joseph and Richard D. Janda (eds).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Malden, Mass.: Blackwell.
- Hickey, R. (ed.) (2003) *Motives for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anda, R. D. (1987) *On the motivation for an evolutionary typology of sound-structural rules*.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 Kiparsky, P. (2003) The phonological basis of sound change. In Brian D. Joseph and Richard D. Janda (eds.).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313-343. Malden, Mass.: Blackwell.
- Labov, W. (1963) *The social motivation of a sound change*. *Word*, 19, 273-309.
- Labov, W. (196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 Labov, W. (1981) What can be learned about change in progress from synchronic description? In D. Sankoff and H. Cedergren (eds.) *Variation Omnibus*. Edmonton: Linguistic Research Inc
- Labov, W. (1994)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Internal Factors*. Oxford: Blackwell.
- Labov, W. (2001)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Social Factors*. Oxford: Blackwell.

- Lass, R. (1997)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Mahon, A. M. S. (1994). *Understanding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New York, NY, US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rrott, J. (2002) Dialect death and morpho-syntactic change: Smith Island weak expletive 'it'. In Johnson, D.E. and T. Sanchez (Eds.), *Papers from NWAV 3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 Sankoff, D. & Laberge, S. (1978) The linguistic market and the statistical explanation of variability. In D. Sankoff & S. Laberge (eds.) *Linguistic Variation: Models and Method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aussure, F. de (1959)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English translation by W. Baskin). New York: The Philosophical Library.
- Wardhaugh, R. (2002)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Fourth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 Zweller, C. (1997) The investigation of a sound change in progress.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25(2): 142-55.
- 钱乃荣 (2003) 《上海语言发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青年报》，2005年1月23日
- 邹依仁 (1980) 《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